

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37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安保,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

“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

生活篇 唯一享受是抽烟 经常游泳,偶尔跳舞

毛泽东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简单至极,但烟瘾非常大。有人说,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还有专机负责运输。对此,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开始对雪茄产生兴趣。有一次,主席召集领导们开会,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眼巴巴地看着他。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烟厂制作的,工艺确实很讲究,一般厂子短时间内还学不会。

警卫孟进鸿承担着给毛泽东找烟的任务。他回忆说:

“文革”开始后,社会秩序大乱,生产这种雪茄烟的烟厂不能正常运转了,主席的烟就供应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请成都军区把任务交下去,让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同时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领导。

主席问过烟的价钱,再三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

在晚年患病前,毛泽东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这是毛泽东年轻时锻炼身体打下的好基础,尤其是他爱游泳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毛泽东的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偶尔举办舞会。然而这被外界谣传为“常在人民大会堂办舞会”,并视为“生活奢靡”的“佐证”。孟进鸿对这种谣言十分痛心。

主席没在人民大会堂办过舞会。跳舞就在中南海,因为来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级就要求我们这些男工作人员必须参加。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的机会。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舞会上一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据吴连登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破四旧”,舞会也被取消了。

财产篇 稿费只有百万元 工资和江青AA制

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工资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

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

吴连登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

有段时间,关于“毛泽东稿费高达1亿3千多万元”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郑长秋生前一直负责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账目,对此事最有发言权。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因为存款利息上调,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元,变成157万元。

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签发。

当年,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每年,他会从中拨给章士钊、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偶尔来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费用都由主席个人负责;偶尔主席工资不够,才从稿费中开支。还有就是不时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作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安保篇 常违反安保规定 爱挤在群众中间

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认为他“搞特殊化”。

对此,警卫团成员、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

其实,保卫主席安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调查,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这样主席就能及时、全面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情况。调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谁走,什么时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执行。调查的内容是走亲访友,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么样,对干部有什么意见等,了解情况后回来写一份报告,随时等待被主席叫去汇报。

大家总以为领导人身边都是壁垒森严。其实,警卫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欢。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像孩子,想法很多,出行很随意,给保卫带来很大难度。

“文革”期间的一次国庆节,傍晚吃完饭,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放烟花。天安门广场当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说走就走。

到了广场,主席刚一下车,百姓就看到了,“呼啦”一下围上来,我瞬间就和主席挤散了。大家都紧张坏了,陪同的周恩来总理急得一身汗。汪东兴赶紧组织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辆车才解围。

这件事之后,叶剑英提议,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希望主席能够穿防弹服。叶剑英管不了那么多,坚持做了防弹服。果然,主席看到后发火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怕人民的,怕人民的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做事的,我们穿防弹服就是脱离了人民啊!你们要怕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

如今,毛泽东逝世已经37年。

吴连登感慨良多:“今年,中央在严抓党风。我就想起主席当年教育我们的——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大秘书就是端茶送水的,没有任何特权。所以我们出去,宾馆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说了: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人们怀念主席,就是因为他在世时,树立了一个正派的党风和家风。”

《环球人物》2013年第34期文/刘畅等

“没什么事情发生,反而比往年过得都舒心。”回顾过去的2013年,武穆总结为“平淡无奇”。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武穆自嘲地说,也许是身体变差了:“因为我想开了,能躲在车里,就不下车干活……”

冲突多了 心态平了—— “被打了,又有机会在家歇着了”

武穆当上城管,已经是2007年的事。武穆在城管队内算不上“老员工”,对比众多四五十岁的同僚,武穆顶多算是刚摆脱“新人”头衔。

每天出门巡逻,是他的主要工作,原先是定点查摊,如今是处理举报,都跟街头执法摆脱不了干系。

“刚来城管队的几年,我是队里有名的‘傻子’,总希望能在无照小贩和严格执法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甚至让小贩主动离开。”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武穆比其他同事更愿意与小贩接触。可惜接触没有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武穆与小贩们打了一年多的“游击”,却没有一个无照小贩达到武穆心中的“平衡点”。

“找平衡”带来的是武穆未曾料想的冲突,2010年,武穆第一次在执法过程中被小贩打倒在地,被打飞的眼镜在地上摔成了两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小贩嘴里喊着,‘城管打人啦’。”

“那时我还很委屈,尤其是挨了打,警察来介入的时候,却说我们这是民事纠纷。”回想过去两年,武穆与小贩争执

一个基层城管的自白

乃至动手,就发生了三次。

在他眼中,动手不意味着就是暴力执法,但这是城管无法回避的问题:“小贩不听劝阻,我们就要查抄,我查抄他不可能乖乖给我,一来二去就会撕扯起来,在老百姓眼中,这就已经是暴力执法了。”

而武穆表示,自己的底线是不会主动攻击对方,“挨打就跑,然后报警,警察一来,反而事情就好解决了。”

2013年初,武穆再次在执法中被打,为了抢夺小贩手中贩卖的线香,武穆被一拳打倒在地:“事后我第一件想到的事,不是我多委屈,而是我又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在家歇着了……”

暴力少了 形象差了——

执法归来,车门把手被人吐了痰

虽然执法中冲突不断,但在武穆看来,真正的“暴力执法”却越来越少。

“一方面,执法人员的素质和管理在提升;另一方面,消极怠工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了。”武穆笑称过去一年中,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下降,因为每逢出车巡逻,他就和同事找个僻静地方休息,“我想开了,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少干。”

与武穆想法相似的城管队员很多,而这种执法思维的转变,还要从李志强案说起。

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城

管监察大队执法人员来到北京科贸电子商城北侧查抄时,发现商贩崔英杰无照经营,城管队员将其三轮车罚没。执法人员准备撤离现场时,崔英杰突然上前举刀猛刺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的颈部,当日18时,李志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李志强的死,是北京城管成立8年来第一起因公殉职的案件,即便7年之后,仍然是许多老城管讨论的话题:“在此之前,很多城管执法的方式跟‘打砸抢’无异,但那之后,柔性执法这个说法就开始出现了。”

2008年11月,一名散发小广告的少年在城管追逐下,跳下筒子河身亡。这一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于城管的质疑。据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部分城管选择消极应对,干脆不下车执法,“不执法自然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但如果不执法,一条大街一天时间没准就出现几千个小广告,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

不管是城管打人还是城管被打,在公众传播中的城管,几乎都是“负能量”围绕。尤其在延安城管双脚飞踹被执法者头部的视频上线后,城管的形象降到冰点。普通执法都会被困观群众指责,已经成为常态。

私底下,城管们讨论更多的,并非“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值不值”。武穆身

边的朋友也常常劝他,工作时不要过于较真,得过且过就行,还有朋友专门给他传了湖北城管在执法时被村民用锄头砸死的视频:“事情就发生在今年3月,视频挺吓人的,让我们看来就是一次挺普通的执法,毫无征兆下就一锄头把人打死了。”

“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不该做,那个不该做,但很少有人能提出真正有用的建议。”虽然暴力执法越来越少,但城管队员的执法形象却每况愈下,几次执法归来,武穆都发现执法车的车门把手被人吐了痰,更有甚者,有人将装着不明液体的避孕套挂在执法车的反光镜上:“从来没有抓到过现行,但谁都明白,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拆违多了 效率高了——

“数百职能中,拆违的形象最光辉”

2013年下半年,武穆的工作开始发生变化,拆除违建,成了城管队一项重要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这对于武穆算是一件好事——在城管负责的数百项职能中,拆除建违的形象可谓最为“光辉”:“除了盖建违的,没有谁不支持拆违,这与查抄小商贩相差很大。”

实际上,拆除违建在2012年就成为城管的一项主要工作:“真到拆的时候,也不用城管动手,全是雇来的施工队。”

武穆坦言,城管看似变化不少,但实质没变,正如他的六年城管生涯:“从想解决矛盾,到逃避矛盾。”

《北京晚报》2013.12.26文/吴楠